

《〈古尊宿语要〉代词助词研究》读后

孙 玉 文

(湖北大学中文系,湖北 武汉 430062)

卢烈红先生《〈古尊宿语要〉代词助词研究》作为武汉大学学术丛书之一,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5月推出而世。这部专著以南宋初年编印的、收有中唐至北宋20家禅师语录的《古尊宿语要》为基本材料,纵横比较,对近古汉语(唐宋时期)的代词和助词系统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,是同类著作中比较严谨、扎实的一部,具有多方面的贡献。

(一)本书的第一个贡献在于:首次发现并研究了唐宋时期一种口语化程度相当高的禅宗文献资料《古尊宿语要》。

新材料的发现,是推动学术研究向前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。陈寅恪先生《陈垣敦煌劫余录序》说:“一时代之学术,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。取用此材料,以研求问题,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。治学之士,得预于此潮流者,谓之预流(借用佛教初果之名)。其未得预者,谓之未入流。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,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。”(《陈寅恪史学论文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503页)由此可见,前辈对新材料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是何等重视!

《古尊宿语要》又名《古尊宿语》、《古尊宿录》,也有人将其称为《古尊宿语录》,它的编者是南宋初年的贽藏主。国内今传48卷本的《古尊宿语录》,曾经宋末的觉心居士和明人的增订,不是贽藏主原编本的原貌。但是,宋版原书传到了日本,得到长期保存。时当清康熙、乾隆年间,日本名僧无著道忠历经十年作了校勘,成校写本《古尊宿语要》。这个校写本1973年由日本中文出版社影印出版。著者说:“在唐宋禅宗语录中,我们选取《古尊宿语要》(以下简称《语要》)为研究对象,是基于下列三点考虑:(1)《语要》在我国本土长期失传,近年日本中文出版社的影印本虽传回我国,但知之者不多,此书语言状况的研究尚属空白。(2)《语要》的编印处在北宋初年的《景德传灯录》和南宋晚期的《五灯会元》之间,也处在南宋中期的《朱子语类》之前,通过对《语要》的研究,我们可以对《景德传灯录》之后,《朱子语类》、《五灯会元》之前的语言状况有所了解;对禅宗语录语言研究来说,恰填补了《景德传灯录》和《五灯会元》之间的空档。(3)《语要》有日本中文出版社影印的、经日本无著道忠校勘的宋本,资料的可靠性程度高于只有明版的48卷本《古尊宿语录》。”(9—10页)除了这三点之外,《语要》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它的口语化程度比《祖堂集》、《五灯会元》等书还高。例如第一人称代词,先秦有“我”、“吾”、“卬”、“余”、“予”、“台”、“朕”7个;魏晋以后,主

要留下了“我”、“吾”;大约南朝或更早,“吾”已被“我”排挤出了口语领域。作为仿古形式存在的“吾”,《祖堂集》出现190次,占“我”、“吾”总数的22.5%;《五灯会元》出现548次,占“我”、“吾”总数的25.6%;而《语要》中出现29次,只占“我”、“吾”总数的6.9%。对《古尊宿语要》这部与《祖堂集》流传情况类似且口语化程度相当高的珍贵文献,卢烈红先生首次以它为研究对象,为唐宋汉语研究引入了一种新材料,这是很值得称道的。正如郭锡良先生在为本书所作《序》中所说:《语要》“作为语言资料,价值远远高于明版的《古尊宿语录》,烈红得以作为研究对象,确有填补空白之效。”

(二)本书的第二个贡献在于:在研究方法上,著者积极地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,采用了历史的观点、系统的观点,穷尽考察,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,共时描写与历时研究相结合,科学分析语言材料,避免以今律古、随文释义等错误做法,大大提高了论著的科学性。代词和助词历史发展的研究,前辈和时贤已作了大量工作,取得了不少扎实的成果。以前的研究,无疑会给后来的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,但也会带来一定的难度。要想有所突破,除了要有新的可靠的材料之外,必须注意方法的科学性。本书著者在科学方法的运用上作了很大努力。

1. 统计数据。本书的资料工作起先是用手工做的。但手工做一来费时,二来又难以做到精确,所以后来购置电脑做这项工作,《语要》和《五灯会元》的资料都是利用电脑检索的,有很强可信性。著者利用别人的统计数据,有所选择;利用已有的索引,也详细注明出处。所以本书提供的许多数据,都有较大的学术价值。

2. 仿古成分和口语成分的分离。《语要》属禅宗语录,不免文白夹杂。说《语要》中有仿古的成分,也就是说,《语要》所代表的时代,其口语系统中,这些成分已经不存在了,尽管《语要》中还沿用了这些成分。著者是怎样知道一个成分在口语中已消失或被保留了呢?一方面,他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;另一方面,他比较全面地进行深入分析。出现的频率、同义聚合中所占的比例、出现的环境、方言存古等,他都注意到了。例如《语要》“余”出现11次,是仿古;“《语要》中‘余’仅在三位禅师的偈颂作品中出现,频率极低,不用于对话,显然它的使用属于仿古性质。”(19页)再如,有人认为新旧两字在书面上势均力敌的时候,在口语中大概已经是全用新式了。

这个观点至少不全面。据著者研究,“你”、“汝”在近古并用了很长一段时间,《语要》“你”出现798次,“汝”出现175次,前者多出后者三倍半。即使这样,著者也不认为“汝”是仿古,因为直至今日,“闽东方言的福州话和闽南方言的海南话,第二人称代词仍用‘汝’。”(29页)所以《语要》中出现“汝”,可能“与地域因素有关”。

3. 共时描写。著者将代词和助词分别放到它们所出现的具体格式中,全面研究其分布状况,进行穷尽描写。代词和助词作各种句法成分,著者都列有统计数据,既有共时研究的价值,也有历时研究的价值。

4. 实词虚化。汉语中大部分虚词是由实词变来的,大部分更虚的词是由较虚的词变来的。本书五、六两章讨论助词,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实词虚化问题。在考察实词虚化的年代、途径等问题时,著者采取严谨的态度,注意正确理解文句,全面观察语言事实。例如,有人认为“过”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已虚化为动态助词。著者认为,这是对文句理解有误,所以他接受绝大多数前辈和时贤的意见,认为动态助词“过”产生于唐代(215—216页)。关于动态助词“了”虚化的途径,一些学者认为唐宋之际“动+宾+了”中“了”前移而为“动+了+宾”,于是“了”变成了动态助词。著者认为,唐代,与“动+宾+了(完成动词)”并存且同为常用格式的有“动+了(完成动词)”,动态助词“了”不从紧贴着动词的完成动词“了”虚化而来,反而要由“动+宾+了”中的完成动词“了”费一番周折前移到动词后才得以产生,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。著者从几个方面论证了“前移说”的不可信,理由是很充足的(196—204页)。

(三)由于著者发现了新材料,采用了科学的方法,所以书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。

有的是补充前辈之说的。例如,著者从《语要》中找出铁证证明“某甲”确实只是“文字上的替代”(20—22页)。

有的是订正前辈之说和时贤之说的。例如,著者以闽方言为证证明“汝”在近古还保留在口语中(28—29页);证明“他”可与别的词语组成同位词组,不只是凑足音节,也不是作远指代词(32—36页);论证近古南方方言亦用疑问代词“甚”,“甚”不是西北方言专有的词(147—149页);证明“几多”至今仍活跃在部分方言中(195页);证明动态助词“了”是由紧贴着动词作补语的“了”虚化而来的,不是由“动词+宾语+了”中的“了”前移而来的(196—204页);论证《祖堂集》卷三“钉钉著?悬挂著?”不是陈述句,而是选择问句,“著”充当补语,不是助词(208—210页);论证魏晋南北朝“过”还没有发展为动态助词(215—216页);论证用于可能补语的“得”是动词,不是助词,“动+得+补”、“动+得+宾+补”、“动+得”、“动+得+宾”中,“得”表可能均具有同一性(243—247页);等等。这些观点,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。

由于《语要》反映口语的程度较高,著者又是拿它作为一个时点跟唐宋时期各时点的其他材料作比较,因此他更多的有价值的观点就体现在下列方面:代词和助词体系在《语要》

时代的调整演变,体系中各成员在力量上的此消彼长。书中展示的发现有:“你”在《敦煌变文集》以前,长期不能与“汝”抗衡,而到《语要》,已以绝对优势成为主要的第二人称代词(26—29页);《语要》时代“他”用为第三人称代词占“他”字诸用法的比例比《祖堂集》《敦煌变文集》时代要高,而且“其”已不用作第三人称代词(41—43页);《语要》时代近指代词“此”的主导地位已经动摇,“这(者、遮)”的使用频率已高于“此(含‘如此’)”(58—73页);远指代词“那”在《语要》时代开始比“彼”占优势(78—79页);《语要》时代“余”系旁指代词进一步衰落,“别”字进一步扩大使用(99—103页);“或”作为分指代词,《语要》中指人的用法萎缩,指时的用法膨胀(107—109页);问人的疑问代词,《语要》时代“谁”占绝对优势,“孰”已衰落(122—123页);疑问代词“何”在《语要》和《五灯会元》中显示了让位于“什么”、“甚么”的趋势(124—149页);《语要》时代,“如何”活跃在口语中,使用2197次,“何如”仅用3次(149—163页);《语要》时代,“动+动态助词‘了’+宾”发育程度高于《祖堂集》、《景德传灯录》(196—204页);“得来”在《语要》中作结构助词已有用例(240—241页);语气助词“么”的使用处于上升趋势(270—274页)。这样有价值的发现,书中还有不少。郭锡良先生给本书作《序》指出:本书作者“收集的材料相当丰富,并能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观察问题,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,把专书语法研究和历时语法研究结合起来了,时有新意。”

读了卢烈红先生的大作后,也有点不成熟的意见,想借此机会向卢先生及读者先生请教。首先,代词和助词里各次类的划分依据应作明确的交代,这对于读者了解本书的语法系统是有好处的。事态助词和语气助词是否该分成两类,还值得研究。其次,本书探讨了代词旧体系的衰亡和代词、助词新体系的起源和发展,但对助词旧体系的衰亡注意不够。再次,个别问题的处理值得商榷。例如,动态助词“过”是由读去声的“过”虚化来的,这不论是从语义联系还是从近体诗的格律都可以看得很清楚。“过”在古代有两个读音,原始词读古禾切,义为经过;滋生词读古卧切,义为已经走过了,超过,超过了。一个强调“经过”这一动作还在某一范围内,一个强调经过“过”这一动作,施事者已经离开了某一范围。但是著者说“动态助词‘过’是由‘过’的本义虚化来的”,不能令人信服。所举《论语·季氏》、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、《左传·僖公三十三年》的例中“过”都当解为经过,读平声,《左传·僖公三十二年》的例中“过”的理解有分歧,既可读平声,也可读去声,这4例都不是典型的用例;只有《左传·成公十六年》、《庄子·盗跖》的例子才是典型的,可以用来作为动态助词来源的用例。

作者:孙玉文,湖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、语言学博士

(责任编辑 吕 慎)